

城市化与新时期文学中的“游荡者”

王志谋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从物质、制度到行为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层面,城市文化都呈现出一种集中与理性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压抑了人的感性生存。城市又提供了挑逗感性的多种商业化物质形式,游荡者应运而生。游荡者代表了人类追求感性的一极在城市化内在的理性化规约下力图保持艺术化生存方式的种种尝试,因而成为考察现代性的一个特殊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思想观念的剧变提供了中国式游荡者群体生成与壮大的条件,后者也由此成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缩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游荡者以其时代及精神特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游荡者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崩解后的游荡者两大类。其中,前者又有反叛型与游戏型之分,后者有寻找型与推销型之别。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异端形象以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价值追寻等的特殊性,勾勒出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审美性生存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文化;工具理性;审美化生存;游荡者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1-0068-07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Wanderer” in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WANG Zhimo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5624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s of matter, system, behavior and cultural values, urban culture presents a feature of 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which depressed human's perceptual existence. The city also provides a variety of commercialized and provocative material forms, and the “wanderers”, who represent the attempt of human beings to pursue sensibility, emerge as the times require. Unde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y try to maintain their artistic ways of existence. Therefore, they become a special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moderni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the drastic change of ideas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generation and growth of Chinese wanderers, and the latter has become a microco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odernity. Wanderer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ime and spirit: subject character wanderers in 1980s and non-subject character wanderers after 1990s. The former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rebellious form and the game form; meanwhile, while the latter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searching form and the peddling form. These heretical images in modernization process drew the outline of aesthetical survival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ir ideology, behavior pattern and value seeking.

Key words: urbanization; urban culture; instrumental reason; aesthetical survival; the “wanderer”

收稿日期: 2017-06-01

基金项目: 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新时期小说中的‘游荡者’研究”(15GZYB63)

作者简介: 王志谋(1978-),男,湖南双峰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一个背景性现实,并由此形成了含意广泛但又人言言殊的城市文化。“游荡者”是“文革”后文学中出现的边缘群体,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隐现,经80年代陈建功、王朔等的书写,9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刻画,到新世纪80后作家群的描绘,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形象类型。对此,李敬泽、吴义勤、汪民安、葛红兵等学者都有过指认和批评。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城市的理性化结构出发,分析城市文化与游荡者之间的关系,继而对当代文学中“游荡者”形象出现的可能及其各阶段呈现的面貌加以分析与勾勒,以期进一步推动和深化这一研究。

一 城市的文化结构与“游荡者”

克劳伯认为,文化可以分为由外到内的四个层面:物质器皿层、制度化层面、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层面、文化价值观念与心理层面。^[1]据此,城市文化的基本结构可概括为体现上述四个层面的人与城市的关系。

首先,物质文化层的城市以“集中”为主要特征,以消费为基本原则,以分层为社会区分,形成了压抑与刺激交织、束缚与放纵并存的形态。

其次,在制度层面,传统的乡村共同体让位于城市化的“有机团结”^[2],以科层化结构为其特征,所以城市社会是固定在某一地点并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的人类群体,他们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并在制度规约下过着一体化的生活。

再次,城市“有机团结”中从物到人的集中化特征及其无孔不入的管理制度,导致城市人生活在一个被称为“钢筋水泥丛林”的环境之中,危机四伏但又充满刺激的生活环境培育出了城市人对应的生活与行为方式。西美尔在《大都会和精神生活》一书中指出:“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3]面对“巨大的万花筒”一般的外部环境,城市人必须合理地组织调整自我和外界的关系以“学会适应城市”。其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西美尔描述的“分隔”和“对象化”。这些方法一方面可以减少额外刺激,但另一方面,这种“分隔”与“对象化”使个人不再作为完整的个体出现。这样,离散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完整人性的丧失。这种丧失的进一步演化定型了城市人的生活与行为特

征:人情冷漠、专业化、离散化、理性化、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

最后,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形成了都市人特有的观念与意识结构。

这一结构首先表现为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结合。陌生人之间出于利益关系的交流越来越多,但真正切入情感的交流则越来越少。城市人都学会了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把握着一个微妙的度:获取利益的角度尽可能开放,在涉及感情的时候常常选择封闭,“带着面具生活”成了都市人生活的常态。其次表现为商品主义文化。城市文化的商业化本质,使每一个城市人不同程度地成为了商品的奴隶,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由此产生,人被金钱所控制、所异化。再次,由商品主义文化出发,功利主义成为都市人生活的基本原则。在理性的人际关系中,人被视作如同一个数字、一种与他自身无关的因素一样来考虑。在此情形下,都市人会与商人、顾客、家庭的仆人,甚至会与经常交往的朋友斤斤计较,传统社会所形成的道德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显得相对苍白。

可见,从制度到意识,城市都将挣扎于其中的个体模式化、规范化了,个体的性情与好恶都必须服从于“城市”这一庞然大物。“‘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是为了居住。他们之所以聚居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这个目标中仅有部分片断在现代世界中得以实现。”^[4]人在现代化的城市中被异化成了科层化结构中的一个原子。栖居于城市中而怀揣诗性梦想的人们,面临城市中物化的现实,以各种挑战性的姿态表现着对异化的抗拒及对个性的坚守与张扬。搜索工业化蓬勃发展以来的思想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波希米亚人”的讽刺性线索。波希米亚人或浅陋消极,或颓废清高,以种种放纵的行为对抗着高度理性化与日益资产阶级市侩化的城市,并在规范化的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发现与创造着另一种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城市生活。他们崇尚流浪,追求艺术生活化,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行为特征就在于波希米亚人在城市中的游荡,并由此在19世纪的巴黎逐渐衍生了一种以“不断寻求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的游荡行为,其行为主体,也被赋予了“游荡者”的称谓。

据玛丽·格拉克考证,19世纪巴黎游荡者的前身是与浪漫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波希米亚文人群,他们通过“夸张的姿态、另类的服饰和反叛的生

活方式来展示身份”,以此来挑战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并逐渐成形的“现代文化的资产阶级表现形式”,通过创造“风格”来赋予物体、姿态和日常实践以显著意义。^[5]其后,随着现代城市的出现及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一些厌倦于工业化生产整一节奏的人开始在街道上游荡,观察、体验都市生活,并蔚为一时之尚。波德莱尔注意到了这些人,并对他们作了理想化的描述,其本人,也被之后的本雅明视为游荡者的典型。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游荡”,作为一种“在,而不属于”城市的存在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困于现代都市物化现实的人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他们拒绝“跟着机器的节奏挥动手臂”的工业化生活,而以“在柏油路上研究花草”的悠闲漫步作一种无声的抗议。“游荡及游荡者的本质是关于自由、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意义的缺失),以及与他人共存于现代城市空间。自由,因为他总是以自我定义与外界定义的辩证法为中心(虽然这种自由也许更多的是一种诅咒而不是一种允诺),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意义的缺失),因为这个形象是关于生命之流与为自我寻找意义的需要,与他人共存,成为对游荡者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我们,以及其他是如何成为我们所认为的他们,所有这些都依靠我们的观察来确定。”^[6]这样,游荡者的游荡就不像它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无所事事,而是成为一种切入了生存层面的审美实践,从根底上质疑着城市以理性为原则对人的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游荡者对城市的反抗并非与早期浪漫主义者一样进行全面反抗,他们反抗的只是城市化压抑人性的方面,特别是其规范化的生活对想象力的扼杀,而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新奇事物,他们则表露出浓厚的兴趣。也就是这一点,决定了游荡者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包含对抗、发现、依赖与投降等众多矛盾性因素的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并由此而演绎出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人们追求人性完满的冲动与诉求在面对现代城市这个庞然大物时的抗拒、谨慎、犹疑、试探与身不由己的卷入,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现实与文化的因素。对不同时代与地区游荡者的不同表现的探讨,是分析其城市现代性的一个特殊而富于启发性的视角。

二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游荡”出现的可能

“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基本涵义,是指变传

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7]它是“人口向城市或城镇集中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8]。城市古已有之,城市化则是工业革命催生下的结果。

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政治型城市化与经济型城市化。^[9]“政治型城市化的核心功能即在于按照政治需要而不是城市发展的自然本性去控制非农人口与非农经济的增长。”^[10]³³新中国首先采取的就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其导致了城乡二元分割,城市与乡村在生产方式、规模、资源占有、收入水平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这种二元分割一方面保证了城市与国民经济的稳定,使社会维持了一个低层次上的平衡;另一方面,它也在剥夺农民分享现代城市文明与国家福利待遇的同时,造成了一种城市对乡村的优越感。

政治型城市化的另一个结果是造成了经济乃至精神结构的畸型。“现代城市是生产与消费的高度统一,一方面,通过现代工业制造出丰富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通过城市中集聚起来的人口及其消费推动着现代工业的再生产。”^[10]³³但建国后所推行的政治型城市化将城市看成了罪恶的渊薮,并强行剥夺了城市的消费功能,城市由此从解放前的畸型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畸型的生产型城市,其政治职能凌驾于经济、文化等职能之上,城市被框定在单一的政治体制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体制的转轨,当代中国进入了经济型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人口迅速扩张。据统计,1979年到1991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11]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8%上升到目前的近50%。^[10]³⁴1994年前后,民工潮开始出现,全国有上亿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政治职能逐渐淡化,个体有了游离于单位的可能,部分人甚至在体制转轨中被单位强行推入市场。长期以来城市单一的生产功能在原有的资源配置模式被打破后,迅速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方面转变,商品市场日益繁荣,服务业勃兴,资本与货币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威力。

长期压制之下的这种突然放松引发了思想的空前混乱与激荡。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整个中国置于军事化的管理之中,城市取消了消费的一维,而以工业化为其主要发展目标,造

成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从思想文化角度而言,则有着空前的统一与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成为了推进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城市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物质从匮乏到丰富,精神从一统到多元,之前的规则与信仰骤然坍塌,但思维的惯性依然存在,主体性诉求与无主潮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导致了怀疑与新的寻觅。趁虚而入的城市以其光怪陆离挑逗着人们的眼球与心脏,上帝缺席之后留下的空荡荡的位置却有意无意地撩拨着人们的神经,这与西方游荡者们的出现有了发生学上的相似。只不过前者主要面对的是商业理性对人性的挟持,而后者脱胎于政治理性松动下对长期政治理性的反叛与不自觉的沿袭。就都市的繁华程度而言,当代中国的大都市已经不亚于欧美的同类都市,这为“游荡者”们“寻找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非理性思潮的流行对旧有权威的挑战也为对抗性行为提供了依据,但反叛前提的不同决定了其与西方游荡者们的不同诉求与面貌。这时,无所适从、退而求其次与心虚的挣扎及无奈的享受就成了新时期潜在“游荡者”们的共同心理机制。

三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游荡者素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文学中基本上没有游荡者的踪迹。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冻、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游”取代“居”成了当代生活的常态,快速的现代化建设导致了一系列城市与社会问题的出现,体制的持续变化以及人们在面临快速变革时的张皇、坚守、困惑与无奈催生了一代代不同的游荡者。这些形象最先以“盲流”的外观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徐星、刘毅然、陈建功等人的笔下出现了与现代都市相联系的游荡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朔也加入了塑造这类形象的队伍;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形象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密集出现于新生代小说中;之后,卫慧、棉棉等以及80后作家们大量书写着这类形象。这些疏离社会的游荡者的游荡动机各不相同,但作为洪流滚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异类,这些终日游荡于城市褶皱中的个体身上记录了中国当代个体主体性发展的线条,其与声势日隆的消费文化之间的拒绝、挑逗、迎合与虚与委蛇,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文化(包括物质器皿层、制度化层面、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层面、文化价值观念与心理层面)对人的冲击,以及个体在这一冲击之下追求审美化生存的努力。按出现时间的先后及其精神特质的不同,新时期小说中的游荡者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游荡者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崩解后的游荡者两大类。前者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包括启蒙时代的反叛型游荡者与转折时代的游戏型游荡者,他们共同生成于主体性话语之中,有完整的人格,以“明确”的“迷茫”与“确定”的“焦灼”为主要特征;后者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包括断裂时代的寻找型游荡者及消费时代的推销型游荡者,主体性崩解是他们出现的大语境,人格分裂、价值缺失的状况导致了其以碎片化的快感与虚无化的拼贴为主要特征。

1. 新启蒙时代的反叛型游荡者。他们主要出现于新时期开始之初,以反叛与迷茫为特点,并多少带有人群之上的优越姿态,专注于思想领域与行为方式的挑战性,与“城市”还没有形成更多的对话,其代表作品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陈建功的《鬍毛》等。

与新启蒙时代思想解放的潮流相应,新时期的首批游荡者们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批判虚伪,反感妥协,以“玩世不恭”的对抗性姿态力图保持自己的真实个性,带有鲜明的新启蒙时代“人的发现”的烙印,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摇滚青年》中的龙翔、《鬍毛》里的森森等都退出了社会主流,游离于规范与体制之外以保留自我。“我只要做个普通人,一点儿也不想做个学者,现在就更不想了。我总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保持自己个性的权利吧!”^{[12]429}《无主题变奏》中“我”的这句话可谓是一类人的心声。

但他们又认识到其反叛的软弱,从而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迷茫。《鬍毛》中的主人公森森想方设法要还父母80元钱以脱离其规范与教育、确证自我,但几经周折后发现,脱离的前提是自己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父母、与社会妥协。“中国还是老爷们的天下”,面对哥哥(同辈中循规蹈矩、融入主流的一群)这样一针见血的评判,“我”“感到了一种自卑”。“我”意识到,“原来全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太“认真”了,但即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还是当不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死皮赖脸的混蛋”,因为“我还持着一颗失去甘美的/种子——一粒苦味的核”。怎么办?

“明儿再说吧”。^[13]

可见,启蒙时代的个性诉求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及现存的体制之间的冲突是这一时代的游荡者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决定他们区别于其他游荡者的主要语境。一方面,被鼓荡起来的个性诉求与激进的时代氛围使他们对这一问题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因而他们更专注于思想领域的对抗与反叛,而忽略了正在变化的城市本身所能提供的另类实现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还不是主动与时代疏离的游荡者;但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以其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在游荡者们带着挫败感的游荡中展开了复杂面貌,并成为他们生命体验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走到街上,随随便便地,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我孤独得要命,愁得不能喝酒,不想醉什么的。我去看了一场电影,不过不仅没能解脱,反而多了不少晦气。”^{[12]404}这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游荡,但主人公并没有在这种游荡中获得快乐,他太专注了,没法融入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现代美感中。不过,他毕竟在无意中享受了城市为其迷茫生活提供的可能方式。“我喜欢在我谋生的那家饭店里紧张张地干活儿,我愿意让那帮来自世界的男男女女们吩咐我干这干那。”^{[12]411}这种享受在不那么追求思想深度的《摇滚青年》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表现。“我”对霹雳舞与摇滚乐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喜欢,“看着这帮宣泄生命的红男绿女,身上一阵阵炽热起来,我好象置身于一个疯狂的自由自在的世界里。”^{[14]330}这个反对婚前性交、吸毒的霹雳舞爱好者真正从其生命体验中把握到了一种现代美感,形成了一种现代审美方式:“总得让人活舒坦点吧。什么这不行那不行的,什么行?什么也不能永垂不朽。”^{[14]338}这个几乎与波德莱尔“过渡、瞬间、偶然”的现代性定义重合的观点预示了思想淡出、生活突显时代城市游荡者对启蒙时代游荡者的超越。

2. 转折时代的游戏型游荡者。他们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再执著于思想而开始关注生活,有了明确的城市意识与自发的审美化生活方式,自动将主体降格,但仍然是“主体性”的代表,并有回归传统价值的冲动,这类形象以王朔及其早期的作品如《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等作品中的一系列人物为代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精英文化渐趋溃退,

市民文化声势日隆。与此前徐星们塑造的反叛、迷茫而又有着启蒙时代优越感的反叛型游荡者不同,王朔敏锐捕捉到了时代的这一转折,刻画了另一类市民化、世俗化的游戏型游荡者形象。他们降低了身段,游走于城市的裂隙之中,开始产生了一种明确的城市意识,代表了商业社会初起阶段英雄主义畸变下的感性化与物质化在游荡者身上的展现。其油嘴滑舌,毫不掩饰对金钱与自由的渴望,作为一个“主体性”的典型,对徐星们所塑造的同类形象形成了一个补充。

王朔笔下的游荡者与人群达成了妥协,他们不再试图将自己与人群对立,相反,他们将自己安置在人群之中,以人群为庇护。“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流急急走着。”“没人注意我,也没有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15]但他们又不是疲于上班下班的城市人流中的一员,他们脱离了体制,并享受这种脱离体制的状态。“所以我一发现大学毕业后才挣五六十,我就退学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16]102}他们有着独立的个性,拒绝对体制的认同,但又并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只是与人群保持一种谨慎的疏离。这一变化,表征了启蒙的淡出与生活世界的突显。

王朔笔下的游荡者们甘于边缘的处境,但又伺机寻找城市的裂隙,对城市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不再阅读《伪币制造者》,而是关心《怎样打官司》,如何把握《市场》。他们将城市当成了一个大的游戏场,主动熟悉这个游戏场中的规则,伺机钻空子;但他们又不是狂热的金钱崇拜者,他们追求金钱,又蔑视为金钱而改变自己,他们享受的是在城市中游戏的自我实现感。《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吴迪规劝张明别再违法,并提出可以给他钱,但张明的回答是“我不缺钱”,他说自己违法的目的是为了“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16]118}在这种对体制与金钱的双重疏离中,王朔笔下的游荡者们几乎有了其后游荡者们的所有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王朔小说中的游荡者们仍然是“主体性”的典型,他们有着差异性的生活姿态,但树立起了新的、明确的生活目标:金钱、享乐、自由,并对此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在王朔的小说中存在一个以爱情来“拯救”游荡者的模式,游荡者们洋溢着“自由”与“个性”的光辉,这对“反封建”的女主人公们充满了吸引力,而女主人公们则

以其“纯情”最终感动游荡者,使其“浪子回头”,重新进入社会规范,典型的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种两极游移的方式表征了转折时期对“个人”相对简单的认识。

3. 断裂时代的寻找型游荡者。他们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价值崩塌、主体位移之后,以惶惑、寻觅、放纵与超脱为总体特征,城市及其现代性在他们的游荡中展开了其所有绚丽与污秽交错的丰富性。“60年代出生作家群”是本类游荡者书写的主体,其中,韩东、朱文等南京作家群作家及邱华栋、刁斗、毕飞宇等的创作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为热闹和混乱的时期,原有体制崩解与新体制形成之间的裂隙为游荡者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与活动空间。此时,旧有的观念惯性尚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一种自由的欣喜与惶惑中,各种主动与被动的游荡者也随之纷纷出现。

个人原子化了,不再是大的潮流与叙事下的个人,对立面依然存在,但反叛却往往使人有一种一拳打到了空处的惶惑。这一状况既解放了个人,又将个体置于无所适从的位置,于是对新价值的寻觅成为了游荡者们的共同行动。朱文的《到厂到底有多远》、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刁斗的《回家》等作品都表现了这种寻找的焦灼与失望。价值的遍寻不获导致了一种坚持,也引发了一种放纵;同时,放纵本身又成为了寻找的新的向度,身体由此被游荡者们赋予了崭新的意义,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我爱美元》等正是对身体价值的深度探寻。

如果说惶惑、寻觅与放纵对应的是一种执著,超脱在某种程度上则意味着一种放弃,但正是在这种放弃中却暗含着新的价值的闪光。《天使的洁白》中,主人公历经各种寻找的实践后,最终将发现与定格都市生活中瞬息万变的“美”定位为惟一值得去做的事情,这也算是游荡者在远离19世纪巴黎的20世纪中国对波德莱尔的一个呼应。

由于这一时期的游荡者既有着主体扩张时代的价值意识,又面临着迅猛发展的城市所带来的声色挑逗,所以,在他们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当代游荡者的所有思想与行为倾向;而作家本人的思想与文化构成又为他们带上了历史与传统的烙印,在他们身上寄寓了更为广阔的断裂时代的丰富性。

4. 消费时代的推销型游荡者。他们活跃于20

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化大潮迅猛推进之时,总体上以享乐主义的态度楔入城市生活,反叛性减弱而依赖性增强;其游荡,既是个性的表达,又是对其欲望化“个性”的一种展销,中产阶级情调成为了游荡对市场暗送秋波的一道面纱。此类形象常见于70后与80后作家的创作中,其代表者如卫慧、棉棉、朱文颖等。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70后、80后作家与城市文化有了更为亲密的接触,城市文化于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这种由城市文化直接培养起来的城市态度使其所塑造的游荡者有了明显的市场化特征。

具体而言,推销型游荡者的特点可概括为物质化、性感化与媚俗化。

首先,从游荡者们对城市的态度来看,其投入与沉迷多于反抗与疏离,由此生成了他们的物质化特征。“我们的生活哲学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17]他们的小说中充满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符码:酒吧、迪厅、摇滚、派对、时尚杂志、西餐、香水、吸毒、放纵的性爱、冷漠、酷等,在这里,物质消费与个性表达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品味”的一种表达形式。

其次,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促成了消费的性化与性的消费化,“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18]因此,性感化成了推销型游荡者展示自身的一个重要手段。香水、唇膏、露背装、丝袜、短裙、高跟鞋等将身体衬托得娇艳馥郁、勾人心魄。《城市里的露珠》中,“我”白天睡觉,夜晚就“洒着‘香奈儿’五号香水,时而把染成栗色的长发梳成长辫,时而盘成一个髻”,跑到夜总会去寻找猎物,“他要有足够的钱,出得起我开的身价。”^[19]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性感为手段的推销方式。

再次,媚俗化是性感化的升级形式,同时也是推销型游荡者们精神溃败的内在表征。如果说性感化还只停留于对原始欲望的撩拨,那么媚俗化则是在欲望之上附加上了更多的“品味”与身份认同色彩。“一般说来,有先锋的地方,我们总可以找到后卫。”^[20]先锋是文化精英的创新性行为,但这些精英却不得不生活在大众社会之中,总是通过“一条金钱的脐带”依附于社会。当身体话语由于其对

立面的丧失而消解了其革命化色彩之后,对身体与趣味的展示性装饰就变成了一种为谋取利益而树立的广告招牌。它围绕着模仿、伪造、假冒以及欺骗与自我欺骗等传达一种完美与完善的信念,以取悦世俗、迎合趣味。推销型游荡者们正是以其“向绝大多数人讨好卖乖”^[21]的态度,通过悉心营构的中产阶级趣味,来推销“优雅”及其物质载体。如棉棉《糖》中罗列着“蒙娜丽莎的微笑”、肖邦和交响乐,麦当娜、甲壳虫唱片、PINK FLOYD 乐队以及帕格尼尼等也相继登场,以标榜着主人公们的与众不同。《上海宝贝》中的倪可玩棋要玩“国际象棋”,听音乐要听爵士乐、苏格兰歌谣、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舒伯特抒情小品,跳舞要跳狐步舞。毋庸讳言,在这种对城市的纵情投入及其规则奉为圭臬的过程中,生发出了一种对“个人”的逃离向度。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新时期经济型城市化以来,之前对个体的漠视与政治规约,以及城市本身的混乱与诱惑,激发了“游荡”的发生及对当代游荡者的文学表达。从启蒙时代到消费时代,游荡者们呈现出一条从追寻个人、表现个人到个体迷失、最终逃离个人的发展轨迹。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游荡者进行的是相对于旧有规范的一种反拨性游荡,有着明确与强大的对立面,并因而有着因对立性而生成的明确的游荡动机与游荡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游荡延续了“思想解放”的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崩解语境下的游荡者则出现与活跃于过渡时期的原子化语境中。彼时,启蒙淡出,生活突显,思想的幽灵尚徘徊不去,而欲望的挑逗却纷至沓来,此一时期的游荡者也因此与都市生活有着更为暧昧与复杂的联系。对上述各类游荡者思想、情感及其与城市关系的进一步研究,相信会对理解当代中国现代性及“个人”的思想与精神状况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 [1] 基辛. 文化·社会·个人[M]. 甘华鸣,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554.
- [2] 康少邦,张宁. 城市社会学[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1986:6-7.

- [3] 格奥尔格·西美尔.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 城市文化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2.
- [4]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M]. 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17.
- [5] 玛丽·格拉克. 流行的波希米亚[M]. 罗靓,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35-44.
- [6] TESTER K. The Flaneur[M]. London: Routledge. 1994: 8.
- [7] 高珮义. 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城市化[J]. 中国社会科学,1990(5):127-139.
- [8] 行龙. 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J]. 清史研究,1998(4):110-117.
- [9] 宁克平. 城市与人: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对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66.
- [10] 刘士林. 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文化城市战略[J]. 文化艺术研究,2010(2).
- [11] 胡伟略. 中国人口城市化挺进新世纪[N]. 中国人口报,1998-08-09(04).
- [12] 徐星. 无主题变奏[M]//肖德生. 1985短篇小说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13] 陈建功. 鬃毛[M]. 昆明:晨光出版社,2015:37.
- [14] 刘毅然. 摇滚青年[M]//刘毅然. 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好.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2001.
- [15] 王朔. 浮出海面[M]//王朔. 过把瘾就死.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62.
- [16] 王朔.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M]//王朔. 过把瘾就死.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 [17] 卫慧. 像卫慧那样疯狂[M]//卫慧. 卫慧精品文集. 伊犁: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30.
- [18] 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8.
- [19] 叶弥. 城市里的露珠[M]//叶弥. 粉红手册.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144.
- [20]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幅面孔[M]. 顾爱彬,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41.
- [21]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唐晓渡,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164-165.

责任编辑:黄声波